

反思性身体技术：一项汽车与身体的扎根理论研究*

林晓珊

提要：随着现代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日益扩大，有关身体与技术的关联已成为身体社会学探索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从“技术身体”的现代性诊断中重新回到传统人类学的“身体技术”的探索之中，考察现代社会中人们使用身体的方式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文章以扎根理论研究为方法，以莫斯的“身体技术”理论为切入点，通过对汽车驾驶培训过程的分析，从制度化、规训化、效率化和仪式化四个维度揭示了“反思性身体技术”是如何可能的。作者指出，“反思性身体技术”是在现代技术与身体的交织中形成的一种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身体技术，它蕴含着对人类行动与技术变迁的现代性反思，它的浮现是对莫斯经典“身体技术”理论的一个拓展，也为身体生成的完整图景增添了更为丰富的色彩。

关键词：身体技术 反思性身体技术 身体生成 汽车社会 驾驶培训

一、引言：“考驾照”中的身体与技术

在现代城市快速驶向汽车化社会的过程中，“驾驶”（driving）作为一种城市空间实践方式，已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参与行为，“驾驶证”则代表着一种准许社会参与的资格和能力。麦克卢汉（2000：271）曾指出，在美国，年轻人甚至把领取汽车驾驶执照的年纪看得比获得选举权的年纪更重要。布希亚（2001：76）也曾说过，今天若没有驾

*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汽车消费与城市生活的变迁》（编号：11JCSH04Y）的阶段成果。本文初稿曾先后在浙江师范大学第18期“青年学者学术沙龙”、第八届“中国社会学博士后论坛”和2013年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消费社会学论坛”上宣读。张兆曙、章秀英、方劲、陈占江、许涛、辛允星、袁松、胡全柱等同事提供了建设性意见，罗红光教授、郑少雄博士等人的评论以及与张杨波博士关于方法论的探讨让本文受益匪浅，特此鸣谢。作者也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及匿名评审人富有启发性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照，则相当于是被“革除教籍”，或是某种社会能力的阉割。驾驶培训作为一种身体技术的制度化获得过程，也由此成为了现代社会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标志着私人旅行者必须获得许可才能选择他们喜爱的流动方式（Bonham, 2006: 26）。恰如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出现过的一样，在当下中国城市，随着汽车对现代生活的影响日益深远，驾驶证在人们心目中的意义也愈发显著，“学车”不仅被城市青年视为时尚，开车更是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项基本生活技能。对于许多年轻人而言，只有通过驾驶培训并获取驾驶证书，才意味着在汽车社会中的真正成长。因而，“考驾照”本身也成为汽车社会中的一个成年礼。

但是，与其他类型的资格考试不同，“考驾照”是一种复杂的身体规训与实践的过程。驾驶培训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把人类身体推到现代技术面前，在人们把汽车这一庞然大物驯服成会听人话的技术工具之前，首先必须驯服自己的身体。而在与现代技术的纠缠互动中，人们使用身体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蕴含其间的“人—技术”关系反映着人类实践或行为的变迁（Ihde, 1990: 20）。在汽车社会来临的时代中，驾驶培训的过程堪称一种全新的“身体生成”过程，^①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汽车社会中的身体观念，并成为塑造符合汽车时代要求的新主体的一个再生产机制。

因此，对“考驾照”过程的身体社会学思考，将我们引入了身体与技术的经典议题之中。法国著名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可以说是这一领域最为伟大的先驱（Sharma, 1996: 252），他最先提出了“身体技术”（techniques of the body）的理论来考察人们使用自己身体的方式。本研究将以莫斯的“身体技术”为切入点，对“驾驶”这一现代身体技术的获得与实践过程进行多维度的考察，深入探讨在技术占支配地位的现代性社会中，我们是以何种方式来使用自己的身体，以及我们的身体究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生成过程才能灵活周旋于现代技术生活之中。在对经验材料的分析中，本研究更为值得期待的一个理论旨趣在于，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重新检视与拓展“身体技术”的理论内涵，从身体的现代性诊断中，揭示一种我们称之为“反思性”的身体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进而探究现代身体生成的新路径。

^① 关于“身体生成”的概念，请参见黄金麟的著作（2006）。“身体生成”指称的并不是一种身体的生物性诞生或创造，而是指称一种在肉体既存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或文化模造（黄金麟，2006: 2注3）。本研究借用“身体生成”这个概念想要表达的大意也是如此，即：生物性身体在汽车社会中是如何经由规则、技术等塑造而成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主体。但身体并不完全是被动的，而是可以积极应对技术变迁的有感受力的主体。

二、身体技术：一个经典人类学理论的回溯

身体技术是一个有着卓越人类学传统的经典理论。莫斯最早对此进行了论述，他对身体技术的观念、分类原则以及传记式的研究，为当代身体社会学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可以说，“身体技术”的概念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通过社会学思考身体行动的方式（Crossley, 2005: 9）。

（一）莫斯的遗产：身体技术的呈现

莫斯对“身体技术”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通过这个词“指一个又一个社会的人们以传统的方式懂得了使用他们自己身体的方法”（莫斯，2008：85）。在他看来，“身体是人第一个、也是最自然的工具。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讲工具，人的第一个、也是最自然的技术物品，同时也是技术手段，就是他的身体”（莫斯，2008：91）。

在莫斯的论述中，身体技术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顾名思义，它们是技术的，因为它们是由一套特定的身体运动或形式组成的；其次，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是传统的，因为它们是靠训练和教育的方式习得的；最后，它们是有效的，因为它们服务于一个特定的目的、功能或目标（威廉姆斯、伯德洛，2003：400-401）。尽管莫斯把身体当作技术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莫斯仅仅看到了身体的物质性，而忽略了身体的社会性。实际上，在身体技术的上述三个基本特征中，莫斯非常重视的是传统的惯习（*habitus*）和社会化的教育对身体技术的影响。他用“*habitus*”一词所要表达的就是身体及其运动与社会文化之间根深蒂固的关系，而且“*habitus*”不是简单随个人和他们的仿效变化，而特别是根据社会、教育、礼仪、习俗、声望等变化（莫斯，2008：88）。在这样的理论逻辑中，莫斯认为，根本不存在自然的行为，每一种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都与身体所处的文化背景有关。

在莫斯看来，人的一生其实就是通过训练获得为社会所承认的身体技术，从而表现自我并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他描述了从孩童到成年人的身体技术的学习和训练。如断奶后的孩童学会吃喝、学会走步等身体技术；进入青少年时期后，主要的身体技术包括女孩的姿态训练、男孩的职业技能训练等；而成年时期的身体技术则包含了更复杂的内容，如睡眠技术、休息技术、运动技术、竞技技术、照料身体的技术、食用技术以及生殖技术，等等（莫斯，2008：97-103）。

当然，莫斯并没有停留在对身体技术的传记式列举，他还从性别、

年龄、效率和传承形式等方面对身体技术的分类原则进行了阐释。在以性别区分的身体技术中，不同性别之间的身体技术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别。在以年龄划分的身体技术中，莫斯尤其强调青少年时期的重要性。对于青少年而言，获得某种特定的身体技术，即标志着他们获得了迈向成人世界的资格，是一种重要的“成年礼”。在以效率分类的身体技术中，莫斯又特别强调一个重要的观念，即灵巧(dexterity)，用来表达那些为了一个目标而协调好所有自身动作适应性的人。在以传承形式划分的身体技术中，主要是依据教育和训练的性质给技术分类。这四个分类原则对于我们全面理解身体技术的不同维度以及对经验资料的分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 拓展的可能性：身体技术的理论追问

尽管莫斯所阐发的身体技术充满着理论原创的光芒，但学者们在看到其中所蕴含的人类学洞察力的同时，也同样发现了“身体技术”理论的内在紧张。例如，恩斯特·伍尔夫遗憾地说道，虽然莫斯对身体技术做了传记式的全景描述，但他依然留下了大量没有回答的问题，如身体技术是如何被激活的？我们如何去理解相同社会文化中的人们在身体技术的风格、效率、水平之间的差异？(Wolff, 2010: 340)。玛格特·里昂则用批评的口吻指出，莫斯视野中的身体是情感缺失的身体，其理论只局限于描述社会文化对身体行为的影响程度，而甚少关注社会过程中的身体能动性和身体机制(Lyon, 1997: 89-91)。厄休拉·夏尔马也认为，莫斯过于强调文化是如何嵌入于身体习惯的本质之中，渗透进莫斯人类学话语之中的一个观念是，身体是一个非常消极的文化教化的容器，身体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再现、控制、规训、训练以及概念化的脆弱的实体(Sharma, 1996: 252)。鲍伊则不无讽刺地指出，“莫斯不是探寻究竟是遗传还是教养对行为负责，而是研究社会的意义如何铭刻在物质的身体上，研究个人选择和代理人和社会结构(权力)的作用，如何限制了个人的和集体的行为，或使之成为可能”(鲍伊, 2004: 47)。事实上，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福柯的身体与权力的研究中，克里斯·希林曾评论说，基于福柯式的思路，永远无法把握生物性、生理性或物质性的身体，因为这样的身体存在方式始终被挡在话语设置的意义构架背后(希林, 2010: 77)。在上述研究中，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文化与权力，而不是身体本身。

近些年来，有关身体与技术的关系已经引发了无数的争论，我们

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身体技术”并非“身体与技术”的简单叠加。在身体与技术的关系中，莫斯把身体当作技术的总体，即身体就是我们的技术手段。“身体技术”尽管遭受上述种种诟病，但这个理论中所彰显的“人们是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这一议题却是明澈深透的。然而，在现代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技术被视为建立在身体之上，为“器官的延伸”（拉普，1986：30）。以弥补身体缺陷、提高身体能力为目的的现代技术，与身体有了更为亲密的接触，现代社会的人们变得须臾不可离开这些身体化的技术。但是，莫斯在身体技术中强调的是使用“身体”的技术，并非直接谈论现代“技术”，而在现代性的变迁中，身体却是与现代技术缠绕在一起。与莫斯所讲的睡眠、舞蹈、跳跃、游泳等围绕身体行动的技术不同，驾驶作为一种现代身体技术，既是一种技术的身体化，也是一种身体的技术化。那么，作为具有主体性的个体，又是如何使用这些作为肉体延伸的身体化技术，而不至于使身体遭受技术的殖民？尽管莫斯与涂尔干等人也曾专门论述过技术与技艺（莫斯等，2010），但他们显然没能预料到身体与技术在今日的这般走向，并给出一个满意的解释。

当然，这也为我们在技术变迁的现代社会中进一步拓展身体技术理论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事实上，莫斯业已指出，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且指引我们有必要研究所有的训练方式、模仿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等基本的方式与传统的力量（莫斯，2008：95）。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新领域。从“步行时代”到“汽车时代”，人类使用身体的方式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今天的汽车社会中，驾驶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一种重要的身体实践，这种技术性的身体实践承载了汽车社会特有的文化意义。不过，遗憾的是，关于人如何使用物质性的身体，如何主动地获得身体技术和运用身体技术的问题，至今还未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秦洁，2010：62）。我们之所以把视角从当代身体社会学的研究回溯到经典人类学中的“身体技术”理论，即是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身体与技术反思现代性社会中的内在关联，重新发现被技术遮蔽的主体性，拓展身体技术的理论内涵。

三、理论浮现：扎根理论的尝试

扎根理论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作质性研究的风格，它指的是透

过有系统地收集和分析资料的研究历程之后，从资料所衍生出来的理论，它以构建或拓展理论为根本旨趣。研究者在展开其研究时，心中并不存在一个预先构想好的理论，^①而是从一个研究的领域开始，并允许理论逐渐从资料中浮现出来（Strauss & Corbin, 2001: 19）。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在这些概念之间建立联系而形成理论（陈向明，2000: 327）。

一般而言，研究的逻辑迥异于写作的逻辑。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遵循着扎根理论中经由经验资料的分析归纳出发而建构理论的原则，但在写作过程中，为了更清晰地呈现现代身体生成的图景，我们需要事先对理论出发点有个交代。本文的理论目标是指向对经典身体技术理论的拓展性研究，并重新思考现代技术社会中的身体生成。因而，与其说身体技术理论是本研究的理论预设，还不如更确切地说是本研究的一个逻辑起点，是一个我们试图从经验资料的思考中进行拓展的分析性概念。我们将从行动者的立场出发，探讨现代技术社会中人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身体，从中揭示浮现出来的理论。在已有的文献中我们也发现，扎根理论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是可以用来推衍和扩充现有的理论，并被用来探索一些人们所知有限或已具备丰富知识的领域（Stern, 1980）。秉承这样的研究理路，扎根理论不仅与本研究没有逻辑矛盾，而且成为最合适本研究的一种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分析资料主要来自两部分，一是笔者于2007-2009年在广州完成的41个深度访谈案例以及部分田野观察笔记（详见林晓珊，2012），这些资料所包含的内容涉及但又不限于城市青年的“考驾照”行为，正是这些最初的资料分析触发了笔者进一步探究“考驾照”背后所隐含的身体生成这一理论命题的兴趣。二是笔者2010-2011年间在浙中某城市完成的20个个案的深度访谈，^②以及笔者以驾校学员的身份在一所驾校中所进行的民族志观察。这些材料以城市青年的汽车驾驶培训为核心，观察和访谈内容涵盖考驾照全过程。案例抽样遵从开放性抽样的原则，选择那些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涵盖度的研究对象进行访谈，从而覆盖研究现象的方方面面并从中发现建构理论所需的相关概念和范畴（Strauss & Corbin, 2001; 孙晓娥，2011）。

^①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文把驾驶培训看作是一套复杂的身体技术的制度化获得过程，但莫斯的“身体技术”并非本文的理论预设，而是我们观察身体与技术之关系的一个切入点。

^② 我的学生孙德俊、辜克霞、王敏霞等人曾经协助过部分访谈和录音誊写，在此表示感谢。

扎根理论中最为繁琐的同时也是最为关键的步骤就是编码，即对访谈资料中的词句、段落不断地进行分析概括和归纳。斯特劳斯和考宾概括了三种编码方法：开放编码、主轴编码、选择编码（Strauss & Corbin, 2001）。^①本研究在对经验材料分析和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就是借助于质性分析软件Nvivo8.0，并按照这三种编码方式展开。下面简单介绍下编码的程序以及理论浮现的过程。

首先，在最初的分析步骤中，使用开放编码来界定文本资料中所发现的概念、属性和类别，其标示方式包括“鲜明代码”和“抽象代码”，^②前者如“紧张”（“第一次握方向盘时心里太紧张了”）、“很爽”（“我想自己一个人开着车到高速路上去，那种心情很爽”）；后者如“成长”（“我觉得自己从原来不懂事的一个小孩子变成大人了”）、“自我突破”（“我原来不喜欢车，一坐车就会头晕，学了驾照之后，也觉得是突破了自己的一个坎吧”）、“身体规训”（“教练不时地在旁边指挥着，有时候骂的很凶”）等等。这一阶段的编码任务在于尽可能地从原始资料中提炼出有意义的概念类别。

其次，在完成这些逐行逐句的开放编码之后，本研究着手进行主轴编码，目的是为了将在开放编码中被分割的资料再加以聚类，通过对概念之间关系的反复思考和分析，整合出更高抽象层次的范畴和维度。例如，我们将“讲授”、“示范”、“练习”、“反复实践”、“纠正”、“提醒”、“警告”、“身体规训”等开放编码贯穿起来，以“规训化身体技术”作为主轴编码的类别标签。再如，我们将鲜明代码“放得开”、“熟练”、“握紧方向盘”、“换档”、“踩离合器”等归为一个类别，并以“效率化身体技术”作为主轴编码。在主轴编码中，我们将类别与次类别相互关联，厘清各概念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对现象形成更精确且更复杂的解释，并以同样的方式完成了“制度化身体技术”、“仪式化身体技术”的二级编码过程（详细过程见本文第四部分）。主轴编码的过程也受到莫斯对身体技术分类原则的启发。

再次，我们进入了三级编码，即选择编码，并大致可以勾勒出即将浮出水面的理论主线。选择编码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已发现的概念类属中经过系统分析后选择一个具有统领性的“核心类属”，将大部分研究结果囊括在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论范围之内（Strauss & Corbin,

^① 陈向明把这三种编码分别称为一级编码、二级编码和三级编码（陈向明，2000：332）。

^② “鲜明代码”是指直接使用访谈对象所使用的生动、鲜明的词语进行编码；“抽象代码”是指研究人员从资料阅读中所抽象出的名词和概念。

2001: 149; 陈向明, 2000: 334)。从前面两个阶段编码过程中所提炼的“制度化身体技术”、“规训化身体技术”、“效率化身体技术”和“仪式化身体技术”四个维度中,^①我们发现了身体技术的获得与实践中的四个基本维度,即合法化的资格获得、标准化的规范训练、能动性的驾驶实践以及仪式性的文化象征,而这四个方面的维度恰与现代社会反思中的自我焦虑、自我意识、自我指涉、自我认同等基本内涵有密切的关联,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技术社会中一个具有主体反思性的全新的身体生成图景。我们将这一浮现出来的理论称为“反思性身体技术”,它是在现代技术与身体的交织中,在制度与文化、规训与灵巧的身体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身体技术,它蕴含着对人类行动与技术变迁的现代性反思。在本研究中,“反思性身体技术”也是我们对经验材料的一种精炼的概念化,它的浮现是对莫斯经典“身体技术”理论的一个拓展,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身体生成提供了一个分析性的理论架构(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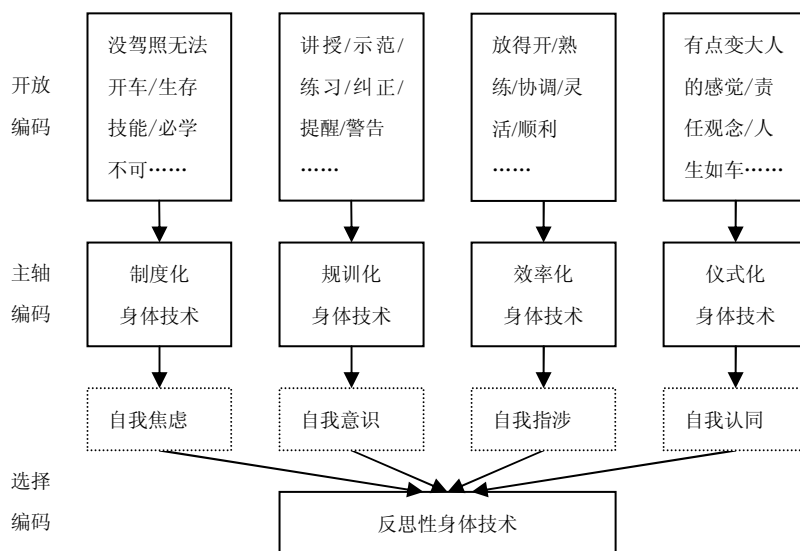


图1 编码过程

^① 在资料分析的过程中,实际的开放编码数量已过百,主轴编码也有10多个(如:“驾照作为人生规划”、“驾驶技术的性别差异”、“驾驶技术与交通风险”,等等),但不是所有的编码都要纳入浮现出来的理论之中。我们只挑选了一些密切关联的核心类属,力求理论的精炼与简洁。同时,我们也以“理论饱和”为目标,在大量的原始资料和编码中寻找相关的属性和类别。

四、驾驶中的身体：身体技术的获得与实践

由于汽车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从物理上、制度上被改造成汽车导向型社会（北村隆一，2006：1）。驾驶培训使人们获得了一种适应汽车导向型社会需要的新的身体技术，其中包含着一系列对复杂身体实践的现代性反思，这一反思性的过程避免了使身体沦为现代技术附庸的困境。驾驶是一种对个体安全和公共领域都存在较大风险的身体技术，现代国家已把“驾驶中的身体”纳入了政府管理的范畴之中，首先需要有一个合法化的资格获得过程，再按照制度设计的标准进行规范化的训练，方能灵巧自如地实践这一身体技术，并在这一仪式化的成长过程中，宣告一个具有反思能力的主体的诞生。基于上述扎根理论研究浮现出来的分析架构，本文接下来将从制度化身体技术、规训化身体技术、效率化身体技术和仪式化身体技术四个维度考察反思性身体技术的出场路径以及现代社会中的身体生成。

（一）制度化身体技术：资格获取与自我焦虑

驾驶汽车已成为现代社会中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但这种权利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必须通过正式的、严格的身体训练才能获得合法的上路许可。如前所述，作为一种身体技术的获得过程，驾驶培训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以国家法律的名义赋予了驾照拥有者合法驾驶的权利，同时也剥夺了一部分人驾驶的权利。与莫斯所言的前现代身体技术相比较，像驾驶这样的现代身体技术除了也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获得之外，还需要一个制度化的认可，这是前现代身体技术所不曾遭遇过的。可以说，驾驶中的身体是一种制度化的身体。这一过程与黄金麟所论述的“身体的国家化生成过程”并无二致（黄金麟，2006：31），这里不仅仅是国家对身体的“收编”，而且还包括在汽车社会中国家对公民社会参与资格的严格管理和对现代城市交通风险的理性反思。

因而，驾驶作为社会参与的一种资格，其合法性需要国家的确认，而如何能够顺利获得这一资格也是许多人焦虑的源头。驾驶培训制度对申请者的身体、年龄等相关条件以及资格考试等都做了详细规定，它首先排除了身体有缺陷的人获得这套技术的可能性。在公安部颁发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对申领机动车驾驶证人员的年龄和身体条件做出了严格规定，包括对视力、辨色力、听力、上肢、

下肢、躯干、颈部等详细的规定。这些还只是申请驾照的最基本前提，在初次申请时，申请人还必须提交县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身体条件证明。当身体出现妨碍安全驾驶疾病时，就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即使驾驶人已经获得驾驶证，当身体条件不适合驾驶机动车时，车辆管理所也会注销其驾驶证。^①

除了规定健康条件外，考取驾照还有年龄条件的限制。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等类型的驾驶证，必须年满 18 周岁。这一年龄与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龄是一致的，但正如麦克卢汉所言，现代城市中的年轻人甚至把领取汽车驾驶执照的年龄看得比获得选举权的年龄更为重要。我们在访谈中发现，许多人在高中一毕业就迫不及待地前往驾校报名学车。

我是高中毕业就去考驾照，其实当时并没想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只知道[未来肯定会去买车子]，所以[开车子的技能是必学不可的]！……[没有驾照就无法开车！]（访谈资料：F-03-H）^②

考驾照是 21 世纪每个人都必须取得的[一种生存技能]……这个是非常需要的，而且[对将来的工作会有很好的帮助]。现在大学里面，差不多[迟早都要考]的嘛。我就是这样想的，所以趁着当时学费不高，赶紧报名去学喽。（访谈资料：M-02-W）

从上述受访者讲述的“未来肯定会去买车子”、“必学不可”、“没有驾照就无法开车”、“生存技能”、“迟早都要考”等主体感受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体对汽车社会到来的“自我焦虑”。而在超越个体的层面上，从近些年来城市社会中所涌现出来的“考驾照”热潮中，我们则看了现代社会中对合法驾驶资格的“集体性的焦虑”。在一个流动性越来越强的社会中，身体流动的能力可以看作是参与社会过程的条件，也是社会权力的表现（王志弘，1998：217）。因而，驾驶培训作为这种合法化身体流动能力的获得过程，展现出了普通个体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即如何才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

① 参见 2012 年 9 月 1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 123 号公布的修订后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的第二章第二节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及第五十二条等处的相关规定。

② 方括号及粗体为笔者在编码的过程中所添加。访谈编号中 F 为女性受访者，M 为男性受访者，中间数字为对应的个案顺序，最后一个字母为受访者姓氏的首个字母。下同。

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驾驶培训制度不只是在提供一种规范标准，更重要的是，它通过规训化的生产，塑造出了大量符合汽车社会需要的新主体。

这一新主体的诞生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资格考试。资格考试的内容和合格标准全国统一，根据不同准驾车型规定相应的考试项目。尽管有不少人批评过去的驾校培训就像速成班，并将居高不下的车祸事故伤亡率归咎于新手技术的不过关，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过去几年的考试内容，新近修改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考试内容越来越复杂了，对于身体技术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例如，2012年12月13日交通运输部与公安部首次联合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纲》规定，自2013年1月1日起，考取驾照在培训学时、教学内容、考试内容上有明显的变化：小型车（C1）第二阶段（科目二）的固定项目训练学时从20学时减少到8学时，取消了桩考，加大了基础操作及实际道路训练比例，将实际道路驾驶操作学时由原来的18学时增加到24学时，以强化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同时，第三阶段考试（科目三）首次增加了“安全文明驾驶常识”部分，单独列出进行考试。这次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被网友戏称为“史上最严格的交规”。

驾驶培训制度的变革与汽车社会的迅猛来临，加深了人们对考驾照的焦虑感和紧迫感。培训项目的增多与考试难度的加强，对身体技术的获得资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高了制度化身体技术的标准程度。作为合法化的驾驶者，其准入资格有了更高的门槛。这一社会标准规范是为个体驾驶者而制定的，所有的规范都包括进驾驶者个体自我调节的社会标准中（Elias, 1995: 25）。对于个体而言，这些社会规范不断地内化到他们的心中，变成驾驶者的“第二天性”（萨夫迪，2001: 117），提高了个体规避现代风险的能力。因而，作为社会标准规范的驾驶培训制度的变迁，可以说是现代性反思的结果，身体技术的制度化获得为反思性身体技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它从制度上促进了汽车社会中文明化身体形态的生成（埃利亚斯，1998）。

（二）规训化身体技术：规范训练与自我意识

在每一个社会，都会面对一个霍布斯式的“秩序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在身体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特纳（2000）提出了一个新的霍布斯秩序问题，即一种以约束的身体为出发点的社会秩序问题。已有学

者指出，我们的社会“秩序”问题，最终是取决于身体的顺从与逾越的问题（威廉姆斯，伯德洛，2003：399）。身体成为社会控制的直接的中心所在。因而，如何对身体的存在进行一个秩序化的工程，便成为每一个社会都必须审慎面对的问题（黄金麟，2006：11）。“驾驶中的身体”也顺理成章地被纳入到社会秩序的规范管理范畴中。^①

作为现代文明的“领先物”（Lefebvre，1984：103），汽车是一部复杂的现代化机器，要驯服汽车，首先需要驯服我们的身体。驾驭这一庞然大物并不像骑自行车那样简单，它需要一整套的身体技术。驾驶培训的一个最重要目的就是塑造标准化的身体技术。从内涵上讲，驾驶培训学校类似于福柯所描述的“监狱”这一类“全景敞视”机构，其目的皆在于通过规范化的训练塑造出“驯服的身体”。福柯（2007：193）曾经形象地指出，“它要通过‘训练’把大量混杂、无用、盲目流动的肉体和力量变成多样性的个别因素”。他认为，规范化是现代社会的权力技术的核心，因此中译者将 discipline 译为“规训”，意为“规范化训练”。^②身体规训的技术遍布整个社会，而驾驶培训无疑是自汽车诞生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身体规训形式，它根据统一的制度安排，对身体技术进行“规范化的训练”。而完成所有的规范化训练，通常是一个十分艰辛的过程，尤其是对初次练车的“新手”来说，打方向盘导致手臂酸痛的比比皆是，甚至内心还充满恐惧感：

我练车的时候是夏天，**[天气很热，我记得我当时早上很早就去练习了]**。……教练车方向盘都很重，离合器也比较紧，在移车库的时候，打方向盘很不方便，往往又要**[用尽全身力气]**将方向盘打死，力气要很多，拼命打，练习的时候觉得手臂还好，到第二天就**[感觉酸痛无比]**，但是没办法啊，还是得继续去练习。……感觉那段时间真的**[很辛苦]**啊！（访谈资料：F-03-H）

因为第一次过“龙门”（限宽门）比较生疏，**[空间距离感比较弱]**，比较容易擦到杆子，而且带着速度冲过去，会有点**[恐惧感]**，期间还要忽然方向盘要打半圈，**[会很害怕，忽然一惊]**。（访谈资料：M-02-W）

^① 例如，在大多数国家的交通制度中，任何放纵身体的驾驶行为，如酒驾、醉驾及毒驾（吸食毒品后驾车），均是交通管理部门严厉管制和打击的对象。

^② 参见《规训与惩罚》译者后记。

规训化训练使“抗拒的身体”转向“驯服的身体”，消解了内心对机器失控的恐惧感，规范了原本杂乱无章的动作。拉开车门，坐上驾驶座，之后便是一系列规范化的身体动作：系上安全带，调整坐姿，握住方向盘，启动发动机，踩住离合器，挂挡，放下手制动，慢慢抬起离合器，车辆起步，轻踩油门，缓缓向前……对“新手”来说，只有将这一套规范化的身体技术练熟之后，才能克服对汽车这一庞然大物的心理恐惧，也才能将身体与汽车协调起来，真正驾驭这一比自己的身体大好几倍的复杂机器。这一整套的身体技术必须围绕着复杂的汽车机器和技术系统而发展起来的，同时还要发挥身体技术的动态功能，并在程序化身体动作的基础上，对道路交通环境的状况做出判断，最终使汽车按照身体的指令来行驶。由此可见，规训化的权力技术，并没有消蚀主体性的存在，它反而激发了主体在技术面前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

在驾驶培训实践中，作为“规训权力”代表的教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①理论考试对年轻人而言一般都不是问题，无需“折磨”自己的身体，关键的场地驾驶技能考试（科目二）和道路驾驶技能考试（科目三）则不得不依赖教练对“身体经验”的传授。教练的指导是对学员身体动作的一种“监控”，他按照规定的动作要领，密切注视学员的操作程序，通过“讲授”、“示范”、“练习”、“反复实践”、“纠正”、“提醒”、“警告”等一系列环节，实现对身体的规训。

每一个动作都有相应的[规定]，到哪里应该打半圈，到哪里应该打死，那个时候你就需要比较耐心地听教练讲诀窍和操作要点，而且要[反复实践]。一个教练会同时带好几个学员，在教我们的时候，他往往是先[讲授]一遍要领，[示范]一下动作，然后就让我们自己[练习]，当我有不正确的地方他就会指出来让我[纠正]，我嘛就不断地[琢磨]，一旦有开偏了，或者撞到柱子了，教练就会跟我讲原因，而我就慢慢地[记牢]，尽量下次不再犯，然后就会越开越好，毕竟熟能生巧嘛！（访谈资料：F-03-H）

^① 关于“公民考驾照是否可不报驾校直接考试”的问题一度在网络上引起争议。尽管我国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申请驾驶证必须经过驾校培训，但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申请驾驶证须满足几项条件：“在道路上学习驾驶，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线、时间进行。在道路上学习机动车驾驶技能应当使用教练车，在教练员随车指导下进行，与教学无关的人员不得乘坐教练车。”因此，想绕开驾校，自学或让他人教会驾驶再直接申领驾照，目前基本上行不通。驾校及教练的规训权力依旧将发生持续的影响。

我那个教练很有意思，他坐旁边[看你开]，[看你动作一不规范，就用钳子敲你]的手，[警告]你，说是让你长点记性，以后就不会忘了……（访谈资料：M-17-C）

上面两段案例材料方括号中加粗的字，都指向了“规训化”的内涵，展示了福柯所区辨的包括纪律、训练和监视在内的三种关键性的权力技术。当然，它们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规训化”论述的佐证资料，而且还在诉说着这样的一种事实：身体技术的获得从来都不是一种自然行为，而是靠训练和教育习得的，这恰恰体现了“身体是由许多不同的制度塑造的”这一基本事实（Foucault, 1977: 153; 转引自：拉什，2001: 424）。汽车社会中的一系列制度、规则通过上述三种相互关联的权力技术塑造了规训化的身体，将个体作为驯服的对象。

然而，幸运的是，在现代性社会中，人对自身行动的“反思性监测”，使人们摆脱了屈身于技术统治的陷阱。技术与权力的合谋尽管塑造了规训化的身体，但这身体却是有反思能力的主体。因而，现代社会中的身体技术，是一种主体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的反思性身体技术。莫斯在对前现代身体技术的考察中也强调了意识介入的重要性，但这里的意识，是文化教化与社会规训的结果，莫斯更多的是强调其理智与效率的一面（莫斯，2008: 105）。而在技术统治占据重要支配地位的现代性社会中，现代身体技术与前现代身体技术有着迥然不同的境遇，后者主要是身体的使用方式问题，而前者则不仅涉及如何使用身体，而且是嵌入于“人—技术”之间的复杂关联之中。因此，自我意识的觉醒不仅包含对理智与效率的技术化诉求，而且也包含一种主体性的确认与反思。也就是说，在接受规训的同时，随着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我们不仅是被训练成一个具有效率的技术化工具，而且还是一个能够驾驭机器的新主体。

（三）效率化身体技术：灵巧实践与自我指涉

莫斯（2008: 94）指出，“训练就像装配一架机器，是寻求与获得一种效率”。前面我们从身体技术的规范化训练中讨论了身体是怎样在被驯服的同时激发了更为强烈的自我意识，实际上，规范化训练的目的就在于将我们的身体训练成为标准化的、具有效率的身体技术，最终使身体变得更加“灵巧”（dexterity），而“灵巧的身体”是与“驯服的身体”完全不同的身体图景。如果说后者是身体技术获得

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被动的规训化的结果，那么前者则是在身体技术的实践过程中对被遮蔽的主体性的重新发现，它以生动、形象的图式展现了人们是如何在技术缠绕的环境中使用自己的身体，也再一次宣告，“驾驶中的身体”是一种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的具有反思性的主体。在卢曼的社会系统论中，自我指涉也叫“自体再生”，是指系统按照自身的规律对其环境中的复杂性和偶发性事件加以记录和加工处理的性质（侯钧生，2010：345）。

一开始会**【规规矩矩，小心翼翼】**，慢慢的就会比较**【放得开】**。一般情况下我开的都不快的。我有一次开嘛，是正常行驶，突然有一个车超车嘛，还好我当时**【打了方向】**，身体一晃，很好的**【避过去了】**，**【不然肯定要撞上了】**。（访谈资料：M-01-H）

根据我的经验来说，开车的时候，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最忌讳的是把刹车当油门使】**，那就玩完了，所以**【手脚的分工一定要搞清楚，手脚要灵活，要互相配合好，而且反应速度要快】**，该踩油门的时候就要踩，遇到路口或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车速】**，这样车子才能平稳嘛。（访谈资料：M-10-Z）

如果将汽车当作有生命的庞然大物，那么驾驭汽车的过程也是一个与汽车沟通的过程。人类之所以能够驾驭汽车而不是被汽车所驾驭，关键就在于人类沟通行为的“反思性”特征。在卢曼看来，反思性“即把行动过程作为行动自身的一部分而加以考察的能力，或者说是行动自身的反思”（Luhmann, 1995，转引自：侯钧生，2010：345）。这种反思性是社会系统适应环境的一种机制。上述前一个案例在身体的使用上，先是“规规矩矩、小心翼翼”，然后慢慢“放得开”，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能够灵活处置，避开了潜在的危险。后一个案例中的小伙子详细介绍了他是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手脚要灵活，要相互配合好”，以身体各个部位的协调配合向汽车发送指令。从这个意义上说，操控汽车就是个人自我控制的延伸。汽车就像是安装在人身上的轮子，车辆启动，犹如迈开双脚；车灯闪亮，犹如身体语言。驾乘的最大乐趣也正在于人们通过熟练使用自己的身体实现对汽车的自由驾驭，使机器变成自我指涉的对象，进而在行驶过程中达到“人一车”合一。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身体不仅仅是莫斯所言的“技术手段”，更是有经验感受的主体（秦洁，2010: 62），是能够对路况做出综合反应，与机器的运转保持一致并将方向盘控制在手中的具有经验感知能力的主体。恰如梅洛-庞蒂所言，人的主体性就体现在其“活生生的身体”之上（梅洛-庞蒂，2001），自我的效能感也正是源于身体技术所具有的灵巧与效率之中，而驾驶的过程也是一种对技术的自我指涉过程，其中隐藏着人类行动的反思性的深刻内涵。

刚学车那会儿，经常[一不小心就熄火了，很尴尬]，[换挡也不熟练]，[油门一踩]发动机就轰上去了。后来我感觉好一些了，[不再笨手笨脚了]，[换挡有些顺利了，手脚也变灵活多了]。练倒桩移库的时候，我记得是‘三进三出’吧，就是需要[看准点再及时的打方向]，左打几圈，右打几圈，[离合器踩下去再踩刹车]，这样就不会一下子熄火。（访谈资料：M-03-Y）

学车的时候，我[比较兴奋]。每次教练接我们去场地练车的时候，我都会自告奋勇地说，教练，让我开开吧。教练看我开的还行吧，就让我开了。我上去后，[握紧方向盘，前后左右观察下，先踩下离合，然后挂档，慢慢抬起（离合），车就往前走了，然后开始逐渐加大油门]，那种感觉就来了。想快就快，想慢就慢，有时候看着自己开的车在路上奔跑，车上还坐着其他人，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访谈资料：M-15-L）

对一个熟练的驾驶者来说，当他进入车内时，发动起来的不仅是发动机，还包括身体各主要部位的功能。如上述受访者，“握紧方向盘”、“换挡”、“打方向”、“踩离合器”、“加油门”以及透过后视镜对路况进行观测等等，这一系列动作都在短短几秒内完成，不用提醒，手、脚、眼、耳等各个部位配合得非常到位，展现了身体作为“技术的总体”的灵巧与效率。换句话说，机器具有唤醒作用，一旦身体被唤醒，身体就拥有不可估量的潜能，驾驶者变成了能够为一个目标而协调好所有自身动作适应性的人，充分展示了行动者对现代技术的“反思性监测”。

由此可见，“驾驶中的身体”不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与“心”相对立的另外一元。由“auto”和“mobility”组成的“automobility”一

词，^①包含着双重含义，不仅指机器本身有运动的能力，也指人类本身拥有自动的能力，这双重意义阐明了“人车混合体”是如何把人类活动同机器、道路、建筑物和文化符号汇集在一起的，并且应当把汽车看成是一种包含人、车、道路、技术等在内的系统（Urry, 2004: 27）。特纳指出，机械手段变成人类身体表层皮的一部分，加速人对环境的控制，导致身体与机器合二为一或产生半机器人等最新革新（特纳，2000: 48）。

机器可以改变人的很多本能，当人与机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机器延伸了身体的可及性，使身体变得更加灵巧，提高了作为技术总体的身体的效率。一位美国学者曾不无夸张地形容：“我们已经变成上帝了，所有上帝能做到的，我们亦可以做到”（Brandon, 2002: 2）。在当下的社会情境中，尽管“身体与机器合二为一”依然略带科幻色彩，但由“驯服的身体”走向“灵巧的身体”，却揭示出反思性现代性背景中身体生成的另一种可能。

（四）仪式化身体技术：文化象征与自我认同

如莫斯所言，身体技术的获得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遗产的结果，任何行为都与身体所处的文化背景有关。汽车在现代日常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赋予了驾驶作为一种身体技术的特殊文化象征意义，亦即只有通过驾驶培训并获取驾照才意味着在汽车社会中的真正成长，因此，“考驾照”的过程已经超越了驯服身体等实践层面的意义，具有了作为文化象征的社会意义。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考驾照”看作是当代城市青年的一种成长仪式，这一仪式过程中所获得的身体技术成为了一种现代性的自我认同。这种自我认同“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吉登斯，1998: 58）。

拿到驾照后，[有一点变大人的感觉]，因为以前是别人开车，我坐在那里的，现在是我在开车，他们坐那里。（我）还在 QQ

^① “automobility”一词不是“auto”和“mobility”的简单相加，而是包含着更丰富的意义，国内有些译著将其译作“自移性”。笔者曾就此请教于耶鲁大学人类学系的萧凤霞教授——她曾指导其博士生（张珺）研究“automobility”问题，她建议，仿照“modernity”译为“现代性”，“automobility”也可译做“汽车性”。从汽车作为一种现代性的隐喻并对现代生活产生如此广泛影响的层面上，我认同“汽车性”的译法，它能更简洁地突出汽车对现代生活的影响。但从汽车与身体的关系上，我比较赞同“自移性”的译法，如同“自传”、“自尊”、“自爱”等概念中的“自”一样，“自移”一词反指人类自身，是一种反身性/反思性的体现。

空间里写了日志，**[纪念了一下]**。（考驾照）应该算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毕竟**[是人生中考取的第一个成人的证件]**，呵，**[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年人，真的长大了，可以开着车在路上行驶]**。（访谈资料：F-06-Q）

每一种身体技术的获得，不仅标志着我们可以更好地使用自己的身体，也标志着人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同孩童学会走路意味着长大一样，这些不同阶段的身体技术意味着我们经历成长的不同仪式。事实上，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要经历大量的仪式过程。美国人类学家墨菲指出，对个体而言，仪式的意义在于构造一种“过渡”，为某人进入新的地位提供一种标志物（墨菲，2009：234）。青春期是成长的最重要阶段，这一阶段所获得的身体技术将在整个成人期都保留与遵从，获得相应身体技术的欣喜感与成就感也是成长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心理体验，这种体验常常被仪式化。由此不难看出，在学会开车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的现代社会中，获得驾驶证对建构城市青年的自我认同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正如吉登斯所说，“在现代性的情境下，变化的自我作为联结个人改变和社会变迁的反思过程的一部分，被探索和建构”（吉登斯，1998：35）。

我觉得拿到驾照了，在路上开车了，**[就有一种自豪感]**。小时候总觉得爸爸会开车，很崇拜，现在自己会开车了，**[感觉很好，很开心，很激动]**。这可是**[国家级的证书]**，教练说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驾驶证。（访谈资料：M-09-Y）

作为一种成年礼，“考驾照”的过程还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成年”不仅意味着一种社会参与的资格与能力，还意味着责任与担当，意味着必须对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和安全负责。从这一点看，获取驾照的文化内涵的确如麦克卢汉所言已超过了获得选举权的政治意义。下面两位受访者所谈及的内容正反映出了这样一种观念：

我记得拿到驾照那天我爸说了一句话，他说**[拿到驾照就是一个真的大人了]**，我当时很是不理解。后来开车的机会多了，时间长了，**[我觉得他说的大人就是担起一种责任吧]**。你要**[对自己的安全和身边的人的生命和安全负责]**。（访谈资料：F-10-S）

除了基本的开车技能的学习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种**【责任观念的形成】**，比如开车的时候必须遵守规则，我爸说**【车轮不沾血，有车那一天更要将这种责任担当好】**。（访谈资料：M-07-H）

“车如人生，人生如车”，这不再是简单的广告词，而是很多考过驾照的人最深刻的体会。操纵汽车，就如操纵自己的人生。当一个人通过了驾驶培训，也就意味着他可以自如地操纵汽车；同样，当一个人逐渐成长，也就意味着他可以逐步控制自己的人生。因而，“开车也算是一种人生的折射”，这是我们把“考驾照”看作是另一种成年礼的最生动的写照，也是对身体技术的深刻诠释。一位年轻的受访者从电影《奋斗》的一个场景中收获了这份汽车与人生的感悟：

我记得在《奋斗》的电影版中，陆涛父亲在教陆涛开车，说**【开车好像就是人生的奋斗】**，你要懂得什么时候加油刹车，**【我觉得开车也像人生一样】**，你在某一段人生中要不断去奋斗，就想油门一定要超越对方。我觉得**【开车也算是一种人生的折射吧，你要不断地向前向前，前面遇到有障碍的时候你要记得踩刹车，不能像我刚开始那样车子会失控】**。《奋斗》电影中陆涛也是第一次开车，他不懂得刹车，把车撞到电线杆上了，他父亲就跟他这么说的。（访谈资料：M-06-F）

从身体技术的实践到其文化内涵的表征中，我们看到了人们在学会如何使用自己身体的同时，一种关于现代社会中的人生体验在“考驾照”过程中是如何成为城市青年的自我认同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反思性已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位，自我成为反思性投射（吉登斯，1998：35）。正是透过这一自我认同，我们看到了物质性的身体和社会性的身体、制度性的身体和文化性的身体是如何交织在“驾驶中的身体”之中，塑造出汽车社会中的新主体。

五、理论检视与拓展：反思性身体技术

身体已是当代社会理论中一项意义重大的思想主题（希林，2011：1）。关于身体的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在近 20 多年来正呈现出方兴未

艾之势，许多重大的理论发现都直指身体在当下的遭遇。在复杂多元的文化变革与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类的身体也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几乎所有的社会变迁都在人类的身体上留下了痕迹。而在身体生成的众多路径中，现代技术是一个关键变量。在身体研究领域久负盛名的学者布莱恩·特纳指出，身体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将是社会学探索正在演进的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特纳，2000：48）。但是，在技术的十面埋伏中，身体的存在似乎变得越来越脆弱。有关身体的现代性诊断，不止一次地发出身体已遭技术殖民的信号，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究竟如何在技术世界中使用自己的身体却尚未有理论上的建构。因此，基于上述扎根理论分析，本文接下来将重新审视身体的现代性诊断，阐述“反思性身体技术”是如何可能的。

（一）技术身体：身体的现代性诊断

美国科技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唐·伊德在《技术中的身体》一书中提出了“三个身体理论”，^①他在“物质身体”和“文化身体”的基础上阐明了身体的第三个维度，即“技术身体”，这是考虑到技术的因素而作为技术建构的身体，技术身体是在与技术的关系中通过技术或者技术化人工物为中介建立起的（Ihde, 2002）。英国身体社会学家克里斯·希林在《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一书中也明确指出了现代人的“技术态身体”。“技术态身体”的观念不仅是说我们所处的工作背景及其他背景都受到技术前所未有的支配，而且意味着生产技术与知识都在向内部移动，侵入、重构并愈益支配身体的内容。我们身体的有机属性的空间安排和功能安排可能已经被改变，以符合社会的结构，乃至挑战了有关何为身体、何为拥有一副身体的传统观念（希林，2011：188）。

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现代性世界中的身体遭遇提供了一个犀利的分析视角。在“机器的征途”中，以汽车为代表的现代技术很大程度上已经重新塑造了我们的身体。弗洛伊德曾形象地说，人类似乎已经变成了某种“佩戴假肢的上帝”（Freud, 1962：38），汽车就是这种作为辅助器官的“假肢”，人类的日常生活乃至人类的身体本身皆

^① 唐·伊德的“三个身体理论”分别是：“身体一”是以胡塞尔、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现象学派提出的作为肉身建构的身体，是具有运动感、知觉性、情绪性的在世存在物，即物质身体；“身体二”是福柯等提出的作为文化建构的身体，是在社会性、文化性的内部建构起的，即文化身体；“身体三”则是考虑到技术的因素而作为技术建构的身体，它穿越身体一、身体二，是在与技术的关系中通过技术或者技术化人工物为中介建立起的，即技术身体（参见：Ihde, 2002）。

因汽车这一现代技术的介入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欢呼汽车给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我们也惊奇地发现，汽车对于人类社会的改造，几近演变成一场机器对身体的殖民，随着人们对汽车的依赖越来越深，人的身体已被机器所驯服（Urry, 2004: 31）。

然而，尽管上述理论视角对我们深刻反思现代技术发展是如何重构人类身体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中，对人们是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的过程却视而不见，身体的主体性被遮蔽了。大多数相关研究关注的只是身体是如何在既定的社会文化情景中再现的，而甚少直接从基础性的感官来谈论身体（Lyon, 1997: 84）。身体在这里只是充当了一个人们考察技术变迁与社会秩序的视角，造成了身体研究中身体的“缺席在场”（希林，2010: 11）。技术固然可以是身体的延伸，但身体本身才是人类最重要的、最原始的工具（莫斯，2008）。在这个技术越来越占据支配地位的世界中，如果仅仅看到身体被机器驯服的一面，忽视了人是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来驾驭机器，那就看不到身体本身作为一种主体存在的可能性。事实上，身体未必是一个全然被技术形塑的被动生成过程。在身体日渐遭受技术殖民的现代性历程中，我们已经非常迫切地需要从对“技术身体”的现代性诊断重新回到对传统人类学的“身体技术”的思考之中，探究现代性社会中人们使用身体的方式和特征。

（二）反思性身体技术：一种新的身体生成

经由扎根理论引导的分析思路，本研究提出了一个从经验材料中浮现出来的拓展性理论概念——“反思性身体技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英国学者罗斯利也曾提到“反思性身体技术”（*Reflexive Body Techniques*），但本研究提出的这一概念不管是在研究背景、对象、过程还是其中所包含的理论内涵来说，都与他的有很大不同。在罗斯利的研究中，“反思性身体技术”是以身体作为首要的工作对象，以便通过特定的方式来修饰、维护身体的技术（Crossley, 2004: 38; 2005: 9）。这里包含着两个具身化的行动者（*embodied agents*），即身体的一部分被用来修饰、维护身体的另一部分，如我们用手来梳头或刷牙，这些行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修饰或维护作为整体的身体，并将作为客体的身体变成主体（Crossley, 2005: 10）。而在本研究中，我们是在现代技术与肉身日益交织的背景中来谈论作为一种具有自我指涉、自我意识的主体特征的反思性身体技术。

理解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反思性”（reflexivity）一词。^①反思性近年来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其在使用上也是极为混乱的（肖瑛，2004：78）。吉登斯（2000：32）认为，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布迪厄等人的反思性概念的范围包括自我指涉、自我意识等。至于反思性如何可能，布迪厄等人指出，如果主体是一种“观念性的动物”，拥有“反过来针对”自身并监控其自身行动的能力，那么就可以说他们是反思性的（布迪厄、华康德，2004：39）。从这些论述中，我们知道，“反思性”是社会行动至关重要的构成性特征。我们并不否认，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对行动亦存在着一些反思性的特征，但是，正是在现代性的变迁中，反思性的意义才得以凸显出来。恰如吉登斯（2000：33）所言，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具有了不同的特征。本研究中的反思性，正是吉登斯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反思性”，尤其侧重于对现代技术变迁背景下的社会生活的反思。在现代性社会中，我们史无前例且又巨细无遗地陷入了技术系统的统治之中，与前现代身体技术相比，现代性身体技术实践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对身体与技术之关联的反思性特征。而反思性在这里所凸显的价值在于，在身体与技术的关系中，它不再是简单地把身体当作技术手段，或将技术视为延伸的身体，而是在技术系统的现代性实践中重新塑造一种身体观念，进而向现代性昭示一种新主体的诞生。

莫斯对前现代身体技术的阐释在现代性的身体技术实践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了理论拓展的可能性。他通过“身体技术”一词指人们以传统的方式懂得了使用他们自己身体的方法，本文通过“反思性身体技术”一词，则不仅包含了人们使用身体的方式和途径，也涵盖了现代性社会中人们对身体的自我焦虑、自我意识、自我指涉与自我认同，即吉登斯所言的“行动的反思性监测”。身体已经成为现代性反思的一部分（吉登斯，1998：111）。“反思性身体技术”意在通过“反思性”的深刻内涵弥合现代身体生成中的理论困境，进而消解莫斯理论在遭遇现代性时的内在紧张以及“技术身体”中的主体性缺失，重新审视身体与技术的现代关联。

首先，反思性身体技术并不否认社会文化对身体的建构，但更为强调身体意识的觉醒，强调行动者对身体技术本身的反思性监控。身体不仅仅是文化的“容器”与载体，也是我们与世界交流的主体与中

^① 关于“reflexivity”一词，国内还有“反身性”、“自反性”等译法。个中差异，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做细考，并统一使用“反思性”的译法。

心。以科学技术领衔的现代性的确以排山倒海之势重构了现代人的身体形态，但现代性亦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吉登斯，2000：34）。任何一项身体技术，不管它是如何受到社会文化的规制，其实践过程必然包含着主体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测。反思性萌发了个体面对技术系统的自我焦虑，进而促进了自我意识，形成了自我认同。因而，就前文呈现的“制度化身体技术”与“规训化身体技术”，抑或是“仪式化身体技术”而言，都含有主体对社会制度、文化形态的反思，是一种自我建构的途径，而非纯粹的单向塑造。如扎根资料中出现的将“考驾照”作为一种身体规划，以及拿到驾照时的那种欣喜与兴奋等均已表明，当驾驶培训已经成为一项社会制度、汽车文化已经成为一种青年亚文化时，这样的结构性背景必然引发城市青年对现代身体转型的积极应对，并以驾驶作为社会主动参与城市空间实践的新方式。

其次，在身体与技术的关联中，反思性身体技术强调身体的主体性，并将现代技术视为一种“自我指涉”，即“自体再生”，而非异体入侵。莫斯谈论的身体技术，是作为“技术总体”的身体，而反思性身体技术则试图分析作为“身体总体”的技术。我们都以自己的身体展开行事，我们的生命体验必然是以自己的身体为中介的（希林，2010：21）。“人一车”体验已经成为现代身体体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作为“身体总体”的技术，亦如身体的一部分，是我们使用身体的指涉对象。梅洛-庞蒂曾举一个盲人的例子说道，“盲人的手杖对盲人来说不再是一件物体，……手杖的尖端已转变有感觉能力的区域，增加了触觉活动的广度和范围，它成了视觉的**同功器官**”（梅洛-庞蒂，2001：190）。与手杖对于盲人一样，汽车对于人类来说，亦是一种“同功器官”，成为了驾驶者身体的延伸，带来了由特别规训的“驾驶中的身体”构成的新的主体（Hawkins, 1986; Morse, 1998; 转引自：Urry, 2006：24）。前述“效率化身体技术”所呈现的即是这样的一种主体，它并非技术对身体的殖民，而是现代技术的身体化表达，因而“驾驶中的身体”不再是一种如步行、奔跑、跳跃等一样的前现代身体使用方式，而是一种与现代高科技持续互动的具有反思现代性能力的身体技术。

再次，反思性身体技术观照的是作为整体的身体观，而非仅仅作为技术手段或工具对象的身体。莫斯将身体技术看作是作为主体的“**I**”（精神、灵魂、心智），对作为客体的“**me**”（肉体、身体的功能部

位)的操作使用,然而,作为现代性社会中的个体,实际上无时不处于“反思性”的状态中,身体是我们在世界中的定位,人类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并不能轻易地把自我与肉体分开。在梅洛-庞蒂看来,自我就在于身体之中,“只有当我实现身体的功能,我是走向世界的身体,我才能理解有生命的身体的功能”(梅洛-庞蒂,2001:109)。尽管我们可以把身体分为物质性的和社会性的两种状态,但“身体决定性地处于世界的自然秩序和世界的文化安排结果之间的人类结合点上,它既是自然的,也是文化和社会的”(特纳,2000:99)。当然,整体观的身体有诸多不同的面向和属性,许多学者曾在整合身体的不同面向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希林(2010)曾以的工作态身体、运动态身体、音乐态身体、社交态身体以及技术态身体的多层面研究主张身体的生物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的整体观点;弗兰克(Frank,1990)的医学化的身体、性的身体、被规训的身体、说话的身体的划分,奥尼尔(2010)的世界态身体、社会态身体、政治态身体、消费态身体和医疗态身体,都表达了同样的整合身体不同面向的努力(参见:余成普,2011)。在本研究中,我们力图以制度化身体技术、规训化身体技术、效率化身体技术和仪式化身体技术架起反思性身体技术的整体观念,以此来表达现代身体生成的完整图景,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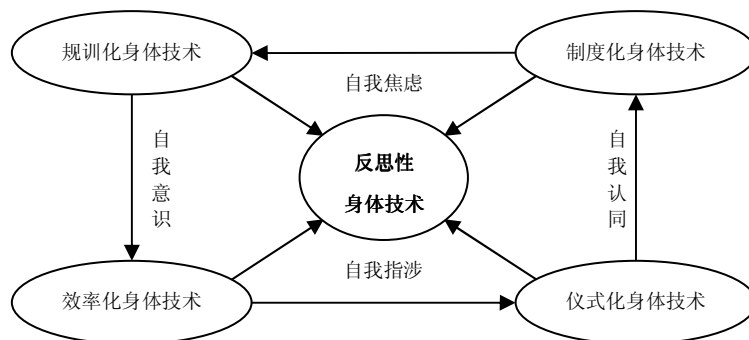


图2 身体生成的图景

在上述身体生成的图景中,“反思性身体技术”对身体的现代性遭遇做出了新的阐释,它不再是莫斯“身体技术”论中被文化所铭刻的技术工具,也不再是现代“技术身体”论中主体性缺失的身体,而是自我的反思性呈现,以及现代个体在技术统治的世界中使用自己身

体的方式。由此，我们从“考驾照”的过程中看到了一种现代身体生成的过程：它从汽车社会的制度化背景中，流露出了对获得合法社会参与资格自我焦虑，并通过主动接受规训化的过程，萌发了主体的自我意识，进而通过效率化的身体实践，使现代机器变成自我指涉的对象，这一仪式化的过程在完成了身体技术的传授的同时，也在现代性的制度文化中获得了个体的自我认同，最终宣告一个具有反思性特征的现代主体在技术越来越占据支配地位的世界中的诞生。

六、余 论

技术和人类自身同样古老（盖伦，2008：2）。莫斯的“身体技术”理论虽然打破了过去认为只有在有工具时才有技术的错误观念，但他显然忽略了现代性实践中人类行动的反思性特征。令莫斯没有料到的是，现代技术的变迁会使个体如此全面地卷入整个社会技术系统之中，使身体成为现代性反思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诞生了一种具有对行动进行反思性监测的新主体。这一新的行动主体看去像是一个“人—车混合体”（drive-car hybrid）、一个组装的社会生命（assembled social being）（Dant，2004：74），但它却使技术成为了“人类自身本质的最重要的部分”（盖伦，2008：4）。如是观之，驾驶培训所塑造出来的适应汽车社会发展需要的新主体，在使用身体的方式上，已然消解了同作为客体的汽车/技术之间的对立，而作为现代性隐喻的汽车，其所向披靡的野蛮个性，只不过是人类反思性的另一种呈现而已。因而，当我们回到身体与技术的经典议题之中时，我们看到了现代身体生成并不是一幅单调的“身体被机器所驯服”的灰暗画面，“反思性身体技术”的理论拓展以一种整体的身体观，避免了将活生生的身体生成过程曲解成流水线上机械的组装过程，为现代身体生成的完整图景增添了更为丰富的色彩。

参考文献：

- 埃利亚斯，诺伯特，1998，《文明的进程》（I），王佩莉译，北京：三联书店。
- 奥尼尔，约翰，2010，《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貌》，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鲍伊，菲奥纳，2004，《宗教人类学导论》，金泽、何其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村隆一，2006，《汽车化与城市生活》，吴戈、石京译，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 布迪厄, 皮埃尔、华康德, 2004, 《实践与反思》, 李猛、李康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布希亚, 尚, 2001, 《物体系》, 林志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陈向明, 2000,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 盖伦, 阿诺德, 2008, 《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 何兆武、何冰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社。
- 福柯, 米歇尔, 2007, 《规训与惩罚》,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 三联书店。
- 黄金麟, 2006, 《历史、身体、国家: 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 北京: 新星出版社。
- 侯钧生, 2010, 《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三版),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吉登斯, 安东尼, 1998,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赵旭东、方文译, 王铭铭校, 北京: 三联书店。
- , 2000, 《现代性的后果》, 田禾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拉普, F., 1986, 《技术哲学导论》, 刘武译,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 拉什, 斯科特, 2001, 《谱系学与身体: 福柯/德勒兹/尼采》, 曹雷雨、王燕平译, 汪国安、陈永国、马海良编《福柯的面孔》,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 林晓珊, 2012, 《汽车梦的社会建构: 中国城市家庭汽车消费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麦克卢汉, 马歇尔, 2000, 《理解媒介》, 何道宽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梅洛-庞蒂, 莫里斯, 2001, 《知觉现象学》, 姜志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墨菲, 罗伯特·F., 2009, 《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王卓君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莫斯, 马塞尔, 2008, 《人类学与社会学五讲》, 林宗锦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莫斯、涂尔干、于贝尔, 2010, 《论技术、技艺与文明》, 蒙养山人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社。
- 秦洁, 2010, 《“下力”的身体经验: 重庆“棒棒”身份意识的形成》,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萨夫迪, 莫什, 2001, 《后汽车时代的城市》, 吴越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孙晓娥, 2011, 《扎根理论在深度访谈研究中的实例探析》,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Strauss & Corbin, 2001, 《质性研究入门: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 吴芝仪、廖梅花译, 台湾: 涛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特纳, 布莱恩, 2000, 《身体与社会》, 马海良、赵国新译,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 王志弘, 1998, 《流动、空间与社会(1991-1997)论文选》, 台北: 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威廉姆斯, 西蒙、吉廉·伯德洛, 2003, 《身体的“控制”——身体技术、相互肉身性和社会行为的呈现》, 朱虹译, 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 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希林, 克里斯, 2010, 《身体与社会理论》, 李康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2011, 《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 李康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肖瑛, 2004, 《“反身性”多元内涵的哲学发生及其内在张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3期。

- 余成普, 2011, 《器官移植病人的后移植生活: 一项身体研究》, 《开放时代》第 11 期。
- Bonham, J. 2006, "Transport: Disciplining the Body that Travels." In Steffen Bohm, Campbell Jones, Chris Land, Matthew Paterson (eds.), *Against Automobility*. London: Blackwell.
- Brandon, R. 2002, *Auto Mobile: How the Car Changed Life*. London: Macmillan.
- Crossley, N. 2001, *The Social Body: Habit, Identity and Desire*. London: Sage.
- 2004, "The Circuit Trainer's Habitus: Reflexive Body Techniques and the Sociality of the Workout." *Body and Society* 10(1).
- 2005, "Mapping Reflexive Body Techniques: On Body Modification and Maintenance." *Body and Society* 11(1).
- Dant, Tim 2004, "The Driver-Car."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1(4/5).
- Elias, Norbert 1995, "Technization and Civilizatio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2(3).
- Frank, A.W.1990, "Bringing Bodies Back in: A Decade Review."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7(1).
- Freud, S. 1962,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r. & ed. by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Norton.
- Ihde, Don 1990, *Technology and Life-worl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2002, *Bodies in Technology*.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Lefebvre, H. 1984,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ress.
- Lyon, Margot L. 1997, "The Material Body, Social Processes and Emotion: 'Techniques of the Body' Revisited." *Body and Society* 3.
- Sharma, U. 1996, "Bringing the Body Back into the (Social) Action: Techniques of the Body and the (Cultural) Imagination." *Social Anthropology* 43(2).
- Stern, R. N. 1980,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Its Uses and Processes." *Image* 12.
- Wolff, E. 2010, "Technicity of the Body as Part of the Socio-technical System: the Contributions of Mauss and Bourdieu." *THEORIA* 76.
- Urry, J. 2004, "The System of Automobili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1(4/5).
- 2006, "Inhabiting the car". *The Sociological Review*.54(1).

作者单位: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工作系
责任编辑: 罗琳